

賴景瑚傳

喬家才

最濃厚的書生氣質

賴景瑚先生逝世了，像一顆閃爍的巨星隕落，令人敬悼懷念不已。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為人爲他自己也常祈禱，但很少向人宣傳宗教。在他的文章裡，稱道他所敬重的上帝，本着中國文人的習慣，稱爲「上蒼」，而不洋化，跟着人喊「上帝」，就可以看出他的中國書生氣質是多麼濃厚。

他一生念念不忘挽救國家，改造社會，移風易俗，死後也要做個榜樣。他遺囑：「不開弔，不發訃文，不收花圈輓幛及奠儀，以糾正今日奢靡、浮誇、鋪張的大喪惡習。他一生敢作敢爲，不屈不撓，有聲有色，多彩多姿。他是一位熱愛國家的革命志士，終身奮鬥不已。他是一位工程師，實則集政治家、教育家、文學家於一身，是一位非常不平凡的讀書人。

我和景瑚先生認識，在五十八年以前，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冬。那時他任黃埔軍校高教班的上校教官，我是黃埔軍校上等兵入伍生，論階級，我們相差的不成比例。記得我們在廣州東山見面時，他身穿花達呢軍服，斜掛皮帶、黑皮鞋、黑皮綁腿，亮的發光。我呢？身着灰粗布軍衣，腰束一條窄皮帶、布綁腿，黑襪草鞋，我們的衣着極不相稱。但因都在爲維護國民黨的生存，不顧安危和共產黨作生死的決鬥，一見如故，

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

以後他的事業飛黃騰達，在革命陣容裡，成了極重要的高層幹部。我呢？在黃埔坐過禁閉，在杭州關進憲兵營的木籠。離開學校，從事情報工作，在太原被山西憲兵抄了家，戴上腳鍊，幾乎喪命；在北平又被日本憲兵抄了家，幾被捉去宰割；最後被自己同志謀害，抄家坐牢，弄得家庭破碎，妻子離散。我們分道揚鑣，各奔前程，四十多年沒有聯絡。一直到五十九年（一九七〇）

，他看到中央日報航空版轉載我在中外雜誌發表的「黃埔當年鐵與血」，從紐約與我來信，我們才又聯繫上，他每次來臺，都會見面。

六十三年（一九七四）景瑚先生以七十五歲高齡，在紐約碧文醫院，由泌尿科專家彭秉坤大夫爲他動攝護腺手術，割去一個小球。康復後來臺，我才知道。這些年來，他的身體很好，精神極佳，想不到經過十年歲月，終被病魔奪去他的生命。這次在空軍醫院動手術，已是八十四高齡，我去看他，他祇說了一句話：「好好一個人會躺著不能動。」

出院沒有多久，第二次再住進空軍醫院，情況不佳，俗話說年紀不饒人，動過手術，很不容易復原。我去看他，呆呆地坐在輪椅上，氣色不好，完全失去以往的熱忱、活潑、爽朗、快樂的表情，沒有說一句話。我非常難過，不忍心再看

見這種可怕的情形，再加上自己腿痛，走路費力，沒有再去看他，竟成永訣。

中外雜誌發行人王培堯兄要我寫一篇悼念景瑚先生的文章，我覺得空言悼念，不能表達對他的敬仰，不如撰寫一篇「我所認識的賴景瑚先生」，將他的生平言行簡略介紹，讓中外讀者，對這位愛國學人，有更深刻的認識。

早歲留美鼓吹革命

賴景瑚先生原名璉，原籍福建，他的父親賴藹卿先生在清末遷居湖南長沙，賴先生幼年在湖南讀私塾，後來進入嶽雲中學，再考入雅禮大學預科，得英文教席美人辛克蒙斯教授的協助赴美留學，他在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二）讀伊利諾大學四年級時，加入中國國民黨，由三藩市總支部發給他的黨證上，介紹人是劉蘆隱和邵元沖。他之所以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最早的影響是在嶽雲中學。嶽雲中學有好幾位老師係同盟會的革命黨人，辛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功成身退，不做官，退到教育崗位，從事百年樹人的建國基本工作，教導學生講人格，重氣節。做到士可殺，不可辱。

當袁世凱進行帝制運動的時候，教國文的胡老師在講堂上大加申斥，責袁背叛民國，沒有幾天，就被袁世凱的黨羽湘督湯漪銘捕殺了。他記

得很清楚，胡老師曾出國作文題「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這篇文章他做的很好，胡老師很誇獎，讓全班「傳觀」，現在胡老師為正義而就義了，他所受的刺激很深，痛恨軍閥、北洋政府。

那時孫文手撰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還沒有普遍發行，他雖崇敬孫中山先生，並不了解三民主義。一年暑假，去芝加哥一家餐館打工。他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六月一日離開長沙，祇帶了九百美元赴美，以後學費生活費全靠暑假打工。這家餐館的一個臺山廚師給他一本三民主義小冊子，他很感興趣，仔細讀完，才知道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那位廚師對他說：「救國不能讓中山先生一個人在那裡奮鬥，你們留學生要加入國民黨，我們的革命才有希望。」

他聽了很受感動，這是促成他加入國民黨的近因。他去芝加哥黨部問清楚加入國民黨的手續，暑假完畢，回到伊大和程天放先生決定，先後加入國民黨。程天放奉黨部命令，去加拿大辦「醒華日報」。他於十一年在伊利諾大學畢業，得到機械工程學士學位，在底特律福特汽車工廠實習，待遇不錯。程天放要他去加拿大幫忙，待遇祇有福特的一半，他犧牲了優厚待遇，去加拿大辦黨報，鼓吹革命，號召留學生反抗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是他第一次為黨工作，為革命所做的貢獻。辦了一年報，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暑假，一年修完康奈爾大學研究院機械工程和工商管理學科，榮獲碩士學位，趕緊回國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十五年回到上海，遇見石瑛先生。這一位湖北留英的冶金專家，曾在倫敦幫助中山先

生組織同盟會，個性坦白、直率、和藹、忠厚，對人誠懇，充滿熱情。將赴廣州，任石井兵工廠廠長，邀他任工程師，他立刻答應，相偕赴粵。到達廣州以後，共產黨大放流言，說石瑛是西山會議派，潛回廣州活動，拼命反對他任兵工廠廠長，共產黨在廣州的勢力很大，當然幹不成了，石先生詳細告訴他共產黨破壞國民黨團結的經過。

任軍校高教班教官

景瑚先生了解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進行分化，硬把國民黨分成左右兩派，拉攏左派，打倒右派。他才想起回國時，在芝加哥遇見中國學生會會長冀朝鼎，勸他回國以後，摒斥國民黨右派，要和左派合作。在返國的麥迪遜總統號大郵輪上，頭等艙有一位潤客，係國民黨派到古巴辦黨的董方城，常跑到統艙和他們聊天，態度和藹，也勸他回國後，參加左派，打倒右派。當時他很奇怪，冀董兩人為甚麼不勸他打倒軍閥和打倒帝國主義，而要他打倒國民黨內的同志，是甚麼道理？這時候才恍然大悟，冀董二人都是共產黨，他們所宣傳的，正是共產黨分化國民黨的一貫策略。

兵工廠的工程師吹了，暫時住在華僑協會，食宿不要錢，但長久做食客，也不是辦法，打算返回上海，在江南造船廠想辦法。突然遇到半年前在紐約認識的李範一，勸他仍舊留在廣州，並且邀他遷到李範一自己的住所，因而認識了中央組織部秘書吳倚滄。第二天李吳介紹他見了代理組織部長陳果夫先生，陳部長歡迎他在組織部工作，於是成了組織部的幹事。組織部有二十幾位

幹事：李範一、曾養甫、余俊賢、蕭鐸等。他在吳倚滄領導之下，成了國民黨的中堅幹部，和組織部的二十幾位幹事，部外的朱家驊、傅斯年、何思源等組織成反共的堅強堡壘，同心協力！同共產黨鬭爭，以保衛國民黨。

組織部又辦了一個「黨政訓練所」，陳果夫任所長，曾養甫任教務主任，景瑚先生任訓導主任，招收了一百多名大專畢業的青年，予以嚴格的訓練。國民黨正發展中，這一所最早的黨校，為黨培養了急需的人才，貢獻很大。

李範一是無線電專家，建議蔣總司令設立無線電網，奉准設立無線電訓練班，於是在天字碼頭附近找好地方，設立了黃埔軍校高教班，招收四五期的同學予以訓練，請他擔任內燃機教官，我在東山何思源寓所和他見面，就在這個時候。

國民黨的無名英雄

北伐初期景瑚先生曾為國民黨打了一次極漂亮的勝仗，贏得一次非常成功的選舉。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春，廣西省國民黨召開全省代表大會，共產黨計劃好要攫取廣西省黨部的領導權，在代表羣中，非常活躍，中央派去的監選委員甘乃光同共產黨一個鼻孔出氣，高唱親共論調。省政府主席黃紹竑怕省黨部落入共產黨手中，增加廣西未來施政的困難，派他的親信黃華表到組織部求援。吳倚滄認為事態嚴重，派景瑚先生親赴廣西，協助策劃對付共產黨，開好代表大會。當時情勢，完全在共產黨和所謂左派分子的控制之下，景瑚先生和黃華表在這緊急關頭進行

說服出席代表，揭穿共產黨的陰謀，許多接近共產黨和沒有黨派關係的代表，都接受了他們的勸告，暗中倒在他們這方面。選舉的結果，忠實同志都當選執監委員，共產黨和左派分子大部份都落選。共產黨萬沒有想到，這一次鬭爭，景瑚先生牛刀小試，大告成功，穩定了廣西的局面。吳倚滄稱他是國民黨的無名英雄。

北伐軍總司令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隨國民革命軍到了武漢，留在廣州總政治部的重要分子都是共產黨分子。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廣州清黨，一部份共產黨分子逃走，一部份被捕。總政治部由曾養甫和賴景瑚接掌，曾養甫為主任，賴為秘書長。不到三天，曾養甫去了京滬，總政治部實際由秘書長負責，景瑚先生幹了七個月，不但肅清共產黨餘毒，而且團結同志鼓舞士氣激勵民心，幹的更爲有聲有色，得到參謀總長李濟琛的贊許，信任有加。

寧漢分裂結束，寧漢滬合作，結果成立特別委員會，實權落在滬方手中，汪兆銘落了空，頗不甘心，由武漢經上海到達廣州，進行反南京特別委員會活動。張發奎的部隊也跟着開到廣州附近，清黨時逃走的共產黨，去了武漢都依附張發奎，這個時候都跟部隊回來了，張牙舞爪，要報清黨一箭之仇，情況非常緊張，局勢惡劣萬分。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李濟琛偕汪兆銘離粵赴滬，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二屆四中全會。第二天，十七日早晨張發奎和黃琪翔藉口打倒桂系，繳了李濟琛部隊的槍，此即爲「張黃事變」。但是他們內部意見也不一致，沒有立刻接收總政

治部，不過賴碰成了他們第一個捕殺目標，却毫無疑問，而景瑚先生處變不驚，從容肆應，居然在張黃事變後，還撐持一個星期，才化裝乘英國輪船，脫險逃到香港。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二）十一月，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景瑚先生得一百五十多票，足夠候補中委的票數，但有人從中破壞，散布謠言，說他是胡派，不聽指揮，藉口選票與姓名寫錯筆劃，半數選票作廢，因而落選，這是極嚴重的打擊。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他當選爲候補中央委員，不久補正，步入黨的中央決策機構。

因爲廣東醞釀兩廣事變，湖南的地位倍顯重要，假如湖南倒向兩廣，局面會更爲嚴重。所以，爭取何鍵，穩定湖南，成了制止兩廣異動的先着。景瑚先生被派爲湖南黨務特派員，擔負這項重任。當時湖南分成擁何和反何兩派，互相傾軋，情況惡劣，不好處理。他堅辭不果，去湖南辦了兩年黨務，不作左右袒，緩和了兩派鬭爭，也穩定了何鍵對中央的信賴，免去倒向兩廣的顧慮，圓滿達成中央所交付給他的任務。

軍官團教政治學科

景瑚先生自以爲不適合搞政治，他不向環境屈服，而又不能突破環境。當他初回國，祇有一年功夫，就擔任國民革命軍後方總政治部秘書長，年齡不過二十八歲，可說是人生的最速最大的躍進，但是他並不以此自滿得意。他說：「我最初以爲所謂貪贓枉法，所謂舞弊營私，都是軍閥

政府所獨有，而我們要徹底革除的。可是，我到廣州，表面上雖爲革命空氣所籠罩，但實際上我很快就知道，政治澄清，一時談不到。而且貪贓枉法和舞弊營私，也和北方差不了多少。」

張黃事變，他逃到香港以後，痛定思痛，自己沉思：「今後不管北伐何時完成，中國何時統一，我必開始新的生活，決不再進入新的矛盾。我既不能改革政治，就應該脫離政治。」

從香港返回上海，知道石瑛先生任上海南市高昌廟上海兵工廠廠長，他去拜訪，石先生立刻發表他爲兵工廠的機械工程師兼總務處長，在廠長室辦公。其他工程師專管一廠、槍廠、砲廠、彈藥廠、鍊鋼廠等，他襄助廠長綜管全廠，無異副廠長。

他在兵工廠工作，正合他科學救國，學機械工程的初衷，幹得很起勁。他又從他所敬佩的石廠長那裡學到做事認真，用錢節省，馭下恩威並用，公私分明的用人做事的方法，和高風亮節、公正廉明，一絲不苟的做人態度。

十七年（一九二八）張羣接任廠長，他隨石瑛廠長下臺而下臺，暫時失業。這時南京成立軍官團，蔣介石兼團長，黃慕松爲副團長，馮軼飛爲團附，曾養甫爲政治部主任，程天放爲政治總教官，程和他情感極好，邀請他來任教，於是再度做了軍官團的上校教官，這一次不是教科學，而是教政治科目。軍官團的團員是黃埔一期到五期的同學，國大代表干國勳，黃埔五期畢業，也在軍官團受訓，據他的記憶，景瑚先生是最好的教官，是一位真正革命者，不同於一般賣膏藥的革命家。

軍官團結束，辦報任教授，經桂崇基先生推薦，做了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的專門委員。他和盧毓駿、陳有豐是工程和科學方面的委員；馬寅初、王用賓、朱經農、張默君、胡樸安、陳去病等專門委員是政治、經濟、文學、哲學方面的委員；張治中、周亞衛是軍事方面的委員。

南京市政府秘書長

後來石瑛先生出任南京市市長，請他任秘書長，官職簡任一級，地位不小。石先生身體不好，對他肝膽相照，言聽計從。離京養病後，秘書長代折代行，成了重要的行政官吏，做的很不差，時間長達三年之久。南京市以建設首都為第一優先，修築全市馬路、下水道、自來水，增設小學校，興建廉價平民住宅，雙管齊下，百事並舉，在石市長偉大的人格號召之下，沒有人敢貪污，敢違犯法令。石市長的飯食粗劣，有人勸他注意營養，他反問一聲：「爲甚麼不看看大多數同胞連飯都吃不飽呢？」

石瑛先生任南京市市長，是行政院長汪兆銘提出任用的，他並不因此買汪的賬，公事公辦。在下關要修一條寬闊大馬路，因英日僑民阻撓，費了很大周折才成功，因此痛恨英日。有一天英國總領事布朗到市政府拜訪他，布朗當然說英文，不會說中國話，他立刻用中國話回答，布朗聽不懂，並說：「市長留學英國，擅長英語。」

「你和中國政府辦交涉，應該說中國話。你不懂，下次帶翻譯來。」說完拂袖而去。布朗進退維谷，祇好請外交當局做調人，才在筵席上寒

暄幾句。從此南京英商不敢再和市政府故意刁難，知道遵守中國法令。一次南京舉行防空演習，石市長看見日本總領事須磨來參觀，以極嚴厲的口氣，申斥須磨：「我們的防空演習，就是對付你們的，你怎麼有資格來參觀？」須磨平日氣焰萬丈，只好面紅耳赤的走開，以後不敢再見市長，有公事接洽，必先向秘書長委婉陳辭。

任連雲特別市市長

他隨着石市長離開南京市政府，時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先生正計劃就連雲港合併東海、灌雲兩縣，建立一個比上海、青島還要偉大的連雲特別市，因爲他任南京市政府秘書長幹的不差，所以要他幹這個市長，去籌備建設。

他抱着極大的熱忱，率領由南京市市政府退下來的一般專門建設人才，去東海岸荒涼的海口，史無前例的去建設一個現代化的都市。連雲港是隴海鐵路的起點，連雲市的建設經費，原打算由隴海鐵路和兩淮鹽運使方面想辦法。而隴海路的錢宗澤一口拒絕，兩淮鹽運使繆秋杰很願意幫忙，但須透過財政部才行。

他們像拓荒者，測量土地，草擬建設計劃，訂定一切章則，很忙碌了一陣子，因爲中央政策改變，財政部不撥鹽兩淮鹽稅餘額款不能不停頓。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侵華很積極，連雲港建市，可能刺激日本，製造糾紛。而且那時全力計劃對日抗戰，注意集中於軍事一方面。建設連雲市却是一件長久巨大的工程，不是三年五年，而是三十年五十年，籌備建市工作祇好結束。不過陳

主席對他們的都市設計、全市測量圖表，一切法規，十分滿意。

景瑚先生對國民黨和總裁非常忠實，西安事變時，正好他父親逝世，準備刻日返湘奔喪。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要他立刻赴洛陽，主持中央黨部洛陽辦事處，隨時向中央報告西安的情況。西安事變，關係國家安危，他移孝作忠，喪事委託朋友們代辦，立刻前往洛陽，一直到總裁脫險，飛返南京，才結束洛陽辦事處，就是明證。

當選行憲立法委員

抗戰勝利前夕，他當選爲中央常務委員，得出席中央政治會議和國防最高會議，已成爲中央決策人物，但因他發言直爽，不滿不合理的種種現象引起總裁許多誤會。他說：「每次在中央開會，總喜歡論時政，有時不知天高地厚的放言高論，常使總裁聽了不愉快，甚至引起誤會。」

「我在中央各種會議及立法院，好對國事發言，每每和總裁的意見相左，尤其是公開反對陳儀主政臺灣及翁文灝出長行政院，更會引起總裁的不諒解。」

三十三年他從西北回重慶出席中全會，把沿路所見所聞的民生疾苦、政治欠清明及若干官吏貪污和政府機構不完整，痛快淋漓，大肆評一頓。他說：「總裁聽了，立刻現出不悅的樣子，雖未對我大加申斥，但已情見乎辭的，既說我講話不負責任，又指我不了解政府當前的困難和抗戰環境的艱苦。」

勝利還都以後，他以高票當選爲行憲後第一

屈立法委員。行政院長翁文灝送出一份施政報告書，第一天開會，就有二十多位立法委員提出質詢，他也是其中的一人。大概因為他質詢的聲調高些，被誤認為他是罪魁禍首。翁文灝向總裁報告，說立法院不但不和他合作，並且有意對他搗亂。景瑚先生回憶說：

「總裁盛怒之下，也很不以我為然，幾幾乎釀成了很大的風波。」

事後許多朋友勸他出國，民國三十七年，他決心出國進修，到了美國。又因他曾任中央海外部副部長，特為代表中央慰問華僑。他在西海岸加州大學、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後，進入加拿大由西而東，再進入美國東海岸的紐約，這時候，國內情況逆轉，總裁下野，國際空氣，對我極為不利。在美國的曾琦（慕韓）、于斌（野聲）主教等都主張「超黨派的救亡運動」，他於是邀請民青兩黨人士、無黨派的社會賢達、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華裔活動分子一起加入這個運動。當時在美國的陳裕清、潘朝英、劉東岩、楊西崑等都是熱心於這個運動的青年。

這個超黨派的救亡運動，定名為「民主自由同盟」，發起人之一的曾琦說：「超黨派救亡運動，非合各黨派為一黨，非使各黨派放棄其原有立場。各黨黨員之合作，不以黨員資格，而以國民資格，不談黨事，而談國事。愛國宗旨相同，反共目標一致。」

曾琦又說：「目前國難嚴重之程度，實為五千年歷史所未有。國家高於黨派，國之不存，黨於何有？欲拯國難而雪國恥，捨超黨派的救亡運

動外，斷無其他途徑可尋。」這種書生之見固然言之成理，但實行起來，自必大成問題。

民主自由同盟不同於蔣廷黻護護胡適做黨魁的「自由黨」，蔣廷黻曾邀景瑚先生參加他的組黨工作，而被拒絕，胡適也不願意做這個黨魁。當時蔣廷黻是中國駐聯合國的首席代表，因為沒有人響應，自由黨胎死腹中，不但沒有成氣候，簡直沒有出生。

民主自由同盟得不到各方的同情與諒解，不但得不到援助，反而被人誤為他們在搞第三勢力，共產黨又說他們是臺灣派到美國的特務。他們經濟沒有着落，曾琦又不久逝世，這個運動祇是曇花一現，無法長久存在。

曾琦是民國四十年五月七日逝世的，民主自由同盟又停止活動，景瑚先生想回臺灣，申請回國，立法院秘書長倪炯聲以某方拒絕入境，說他在海外的國際宣傳做得很不錯，應該繼續留美做下去。立法委員谷正鼎、謝澄宇等多人聯名給他寫信，促他不顧一切，回院報到，他決定不自討無趣，而願自我放逐。

聯合國中文組主任

景瑚先生響應民主自由同盟完全是基於愛國救國的書生之見，他的心地是極其善良的，他的為人和治事，誠如早年石瑛先生辭去南京市長時，對他說的一段話：「我因為得了你為秘書長，才能任職三年。否則以我這樣的脾氣，三天也幹不下去。」這段話證明他忠於職守忠於長官，受人愛重的事實。

他既不同臺灣，單靠在紐澤西州喬金柯德大學教書，在紐約很難維持生活。聯合國秘書處以語言關係，分為中、英、法、俄、西班牙五個翻譯組。各組主任由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推薦。中文組內部發生糾紛，組主任去職，我國代表團因代表權問題爭辯不休，失去推薦新主任的發言權，因此改為對外公開考選的辦法。

一百多人報名參加考選，多為我國文教界和外交界的知名之士。景瑚先生經許多朋友勸說，也報名參加，歷時半年，經過四、五次考試甄審。主持考試的五六個人，海闊天空，無所不問，如若學養不湛深，識見不廣博，不能對答如流，就會被淘汰。考到最後一次，祇剩下兩個人。景瑚先生以優異成績被甄審合格出任聯合國中文組主任。

聯合國服務人員，一律叫「國際公務員」，景瑚先生由特別市政府的秘書長、連雲市長，做到國際公務員，而且是從一百多人當中脫穎而出，自後與全世界的政治領袖交往酬酢，躋身國際政治舞臺，為中國讀書人爭得無上的榮譽。

以前中文組幾乎和中國代表團脫了節，因為他們不敢和中國代表團接觸。他到聯合國的第二天，就去訪問我首席代表蔣廷黻，表示要和代表團合作。以後十多年在合理、合法的情況下和代表團維持密切良好關係，黨政外交界人士也另眼相看，對他異常敬重。聯合國的職員工作滿一年，就可簽訂永久聘用的合約。景瑚先生因大陸為中共所竊據，聯合國不答應簽永久合約，於是一年簽約一次，或三四年簽一次。中共混入聯合國

中 外 雜 誌

，是在他退休以後。

聯合國英文翻譯成中文，都是直譯，讀起來很生硬，不中不西，不知所云。但它有莊嚴的法律意義，必須維持正確性。他任中文組主任以後，在維持正確性外，更全力改善文字本身的素質，使它通俗、簡潔、流暢易讀。

他在聯合國十三年，難能可貴的，沒有請過一天病假，可以說是國際公務員的模範。

任西北工學院院長

景瑚先生在長沙讀雅禮學校的時候，感覺到中國科學不發達，工業落後，無法和列強競爭，決心出國學科學，矢志工業救國。先想留法勤工儉學，後來聽說，學生到了法國，既不能動工，又不能儉學，此路不通。當時他家經濟情形已走下坡，無法負擔他出國的費用。於是決定赴美，半工半讀。美國伊利諾大學費用比較少，得到入學許可，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六月一日離長沙，經上海、日本橫濱，橫渡太平洋，到美國學機械工程。

他在早年出國途中會有兩次疏忽，造成很大錯誤，幾乎使留學成爲泡影。一次是在上海登輪，黃包車拉到碼頭，車夫看見他的護照放在車上，以爲是錢包，他一下車，車夫拉上護照飛跑，轉瞬不見人影。沒有護照，到美國如何登岸？一次是到達橫濱，借幾位同學到東京觀光，超過了開船時間，幸岸上有人照顧，才乘小火輪趕上輪船。這兩次疏忽，都由他的老師辛克豪斯 Paul M. Hinkhouse 替他彌補，才化險爲夷。俗話

說：「吃一次虧，長一次智。」這兩次教訓，使他一生處事小心謹慎，再不敢大意。

他初次回國，在黃埔高教班任教，後來又在南京軍官團任教。兩次都是上校教官，爲時雖短，對他從事黨政工作很有關係，接着任中央大學和政治學校教授，在中大教工程，在政校教三民主義。已經和教育結下不解緣。

七七事變，抗戰爆發，平津的學校內遷，清華、北大、南開三校遷到雲南昆明，成立了西南聯大。平大、師大、北洋等校遷到陝西城固，成立西北聯大。又北洋工學院、平大工學院、東北大學工學院，焦作工學院四院在城固古路壩合併成立西北工學院，以原任北洋工學院院長李書田爲院長，學生一千三百多人。一開始就開了一次大風潮，停課半年，北洋的學生二百多人離校，到了四川的廣元，要去重慶請願。

四個學校的學生混合在一起，各有各的傳統習慣，門戶之見不容易化除，再加上共產黨分子從中挑撥，風潮一起，就不可收拾。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景瑚先生奉命調解西北工學院的學潮，並代理院長。路過廣元，去說服了北洋工學院的二百多個學生，帶他們回漢中安頓，暫不和其他三校的學生接觸。警備司令祝紹周打算派軍警護送他到校，經他謝絕，他認爲辦教育要靠軍警保護，會失掉爲人師表的資格。他不要學生畏懼，要以德服人，讓學生信任、信仰師長。

工學院還有八百多學生，一百多教職員留守在院內，他偕同教務長潘承孝到達古路壩西北工學院，第二天早上，召集學生講話，宣布明天正

式復課。補發教職員的半年欠薪，並保證今後可使學生安心求學，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擾和威脅。到場聽講的祇有二百多人，其他不是存心觀望就是表示拒絕。第三天監督各班各系正式上課，人心逐漸安定下來。教育部指定開除八名煽動風潮的學生，每院二人，他沒有照辦，幾經函電商討，一一保送其他學校相同科系，繼續完成學業。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他勉勵二百多名畢業生「挺身出來，負荷抗戰建國的時代使命。」他告訴學生：「僅僅做個有技能的工程人員還不够，一定要做勇敢健全、有爲有守的現代國民。」這些話也是說給在校未畢業的學生們聽的，精神教育，人格薰陶，收效最大。

由西工到西北聯大

他整頓西北工學院，並沒有甚麼奧妙法寶，不過是：「不走曲線，不講廢話，認爲要做的立刻做，決不拖泥帶水。做不到的老實講出來，不開不兌現的支票。凡事防患於未然，不讓小誤會變成大糾紛。學術標準要提高，讀書風氣要積極培養。一面要求學生尊師重道，不許學生侮謾師長、干涉學校行政；一面又要增進教學素質，鼓勵教授精益求精」而已。

他自己覺得「以學工程又教工程的人，今能辦一工科大學，造就對抗戰有貢獻的工程人才，實在是書生報國的一個最好的途徑。」所以，全力以赴，平息了風潮，經過三年盡心盡力辦學，校務蒸蒸日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中央嘉許，

地方人士也非常滿意。

西北聯大分三個學院：文學院、理學院和法商學院。學生一千一百多人，也在鬧風潮，最奇怪的是國民黨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也鬧意見，相互對立，令人啼笑皆非。行政院突然決議任命他為西北大學校長。西北工學院已有基礎，他不願丟下已有感情的工學院，去接辦一個燙手的山芋西北大學，堅決不幹，西北工學院的師生又電教育部挽留。結果，教育部作成決定，要他以西北工學院院長兼西北聯大校長，這樣一來，他更加不同意。他認為一人兼任兩個大學的校長，極不合理，於是連西北工學院院長職務也向教育部請辭。他把校務交給教務長潘承孝代理，未經批准，即離開城固，漫遊關中名勝古跡。

西工的師生挽留他，西大的師生派代表來歡迎他，兩個學校的校長都辭不掉，祇好挑起又一副沉重的擔子，並向西工師生保證，他決不放棄西工，也不將兩校合併，以安定西工的人心，不再引起騷動。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五月五日他接長西北聯大，第二天就集合學生開會，並向學生講話，這是他人從來不敢嘗試的。他以「安定第一，紀律至上」來告誡全體學生，他說：「什麼擁護與打倒，什麼歡迎與拒絕，什麼請願與示威，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思想落伍。我在任何環境之下，必不受人要挾和威脅，更不容許任何人干涉學校行政。我尊重學生人格，決不利用學生。但也不讓我的學生受人利用，做人工具，供人犧牲。」正氣凜然獲得忠貞學生的擁護，同時也壓服了共

黨職業學生的蠢動陰謀。

第三天下午茶會招待全體教職員，申述先求學校安定，再求進步和發展，全校很快的充滿了祥和氣氛。在一千一百多學生當中，有一百多「民先」分子。「民先」是共產黨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簡稱。抗戰以前，共產黨就利用「民先」來控制平津各校。

景瑚先生就職一月以後，給民先分子每人一封信用，請他們回信承認過去的錯誤，表示今後一心求學，不再在學校裏滋生事端，或作政治活動。一定相信他們的諾言，不咎既往，並保證他們安靜讀書到畢業。如有任何不同意見，可以隨時到校長辦公室坦率討論。

有幾名重要的共產黨分子不告而別，等了幾天，不見他們的踪影，按照規章把他們開除。九十多人回信悔過，以後循規蹈矩，一一畢業。有四個四年級的學生自動請求去西安省黨部受訓一年，一年後讓他們回校參加畢業典禮。以德服人，是釜底抽薪的辦法，到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他辭校長職，調任教育部常務次長，西北大學已風平浪靜，沒有再發生過風波。

在十分險惡的環境裏，景瑚先生身兼兩座大學的校長，在抗戰大環境中，絃歌不輟，為國家，為抗戰培育了好幾千的人才，充分顯露出大教育家的才幹、襟懷和氣度。

報紙雜誌專欄作家

景瑚先生是一位機械工程碩士，一般說來，學科學的人，國文總比較差一些。但對他而言，

大大不然。他的文筆流暢，優美、簡潔、有深度，引人入勝。

他開始辦報，是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程天放在加拿大多倫多辦「醒華日報」，請他去幫忙，繼而由他接辦一年。醒華日報係國民黨辦的報紙，經費不足，一個人要做兩個乃至四五個人的事。他一個人寫社論、編新聞、劃版面、設計廣告、校對，一切事務都由他一人包辦，工作一年，十分辛苦，却使他成了內行的新聞記者。他做專欄作家，寫專論文章更充分表現了他傑出的才華，他的作品受讀者歡迎。

初返回廣州，就和何思源、董秀明等創辦「奮進」月刊，在理論上展開同共產黨鬭爭。當時國民黨正在容共；而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專做分化工作，把國民黨分為左右兩派，擁左派打擊右派，使國民黨同志自相殘殺。在宣傳上，造成輿論，混淆觀聽。國民黨同志是啞吧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奮進」出刊，成了國民同志的喉舌，有了反擊的力量。為對華僑宣傳，他又辦「革命華僑」，可惜這兩種刊物都沒有辦多久，清黨後，就停刊了。

十七年繼續北伐，他到南京任軍官團政治教官。時南京祇有陳立夫先生主辦的「京報」，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機要科長，京報經費又出自總司令部，無異是總司令部辦的報紙。

立夫先生忙不過來，知道他在多倫多辦過報，請他任京報的總編輯，他欣然答應，每晚要寫一篇社論。他以京報要替人民伸張正義，為社會打抱不平的志趣來立論，有時還大膽地批評時政

中，一般青年，大中學生，社會大眾都愛讀他的文章。可是總司令有他獨到的見解，對於某些社論觀點，認為不妥當，甚至召至總司令部當面訓斥。總司令以為京報經費來自總司令部，人們以為社論是代表他的意見，會引起社會上的誤會，於是命令陳立夫先生，停辦京報。

此時中央日報已由武漢遷回南京，有一天中央宣傳部長劉蘆隱和他談話，要他擔任中央日報的總編輯。中央日報沒有社長，祇有總編輯和總經理，分別向中央宣傳部負責。劉蘆隱對他說：「胡先生（漢民字展堂當時立法院院長）賞識你在京報所寫的社論，若以京報主筆來主編中央日報，應該可以融合各方面的主張，保持中央言論方針的一貫性和統一性。」

陳果夫、陳立夫先生也同意他主持中央日報，一幹就是兩年半。因湯山事件，有人找他撰寫社論，批評胡漢民先生，被他拒絕，於是給他扣上「胡派」帽子，才發生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而以廢票被拉下來。其實他和胡先生祇見過兩次面，說他是胡派，有些不够格。大陸變色的時候，他在美國，主張超黨派反共救國運動，獨力經營「華美通訊社」發佈反共消息，撰寫反共文章，每週出版一次，多達二三十頁，免費航空寄南北美洲各華文報紙雜誌。東到古巴，西達檀香山，北至加拿大，南到秘魯，所印發的資料，幾乎都被各報全部採用。書生救國，引以為快。印通訊稿的舊油印機，是僑領李覺之借給的，曾琦幫他寫文章，翁德林幫他印刷。裝包郵寄，十分辛勞。

後來覺得單辦通訊社，不够深入，而一二人苦撐，經濟精力都感不繼。不如在紐約辦一個像樣的日報。經濟發展、陳立夫、陳裕清諸先生協助，紐約「華美日報」終於問世，延續迄今。

擔任聯合國中文組主任以後，不便寫政治性的文章，然藉聯合國出差的機會環遊世界，撰寫了許多遊記散文，發表於華美日報自由神、中央日報副刊、中外雜誌、自由談、東方雜誌等國內外著名的期刊。他第一次來臺灣，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迎風飄揚，感動得幾乎跳起來。

他在聯合國，接觸到全世界形形色色的風雲人物，有的彬彬有禮，有的得意洋洋；有的嬉皮笑臉，有的儀容端莊；有的標新立異，有的裝腔作勢；有的威風凜凜，有的慈祥愷悌；有的輕佻浮躁，有的倜儻不羈；有的高視闊步，有的奸險狡滑。這樣一夥人在政治舞臺上叱咤風雲，全世界能有安寧的日子嗎？

閱中肆外有筆如椽

他的智慧極高，目光銳利，頭腦冷靜，觀察分析世界各種問題，都有獨到之處，不同凡俗。他的好友馬彬（筆名南宮搏）任臺北「中國時報」社長，要他寫些討論國際問題的文章，為他特闢「國際問題論叢」專欄，於是他成了專欄作家，也成了最受國內外讀者歡迎的人物。

寫專欄不容易，他毫不馬虎，他說：「我每次寫一篇專欄，必須收集資料。因而每天必讀十多種報章雜誌，還要廣泛閱讀專書，深入研究專題。我下筆前更要作精密謹嚴的思維，完稿後

還要對選詞及練句下功夫。絕對沒有一篇為爭取時間而輕率草成的。」

為甚麼他要寫十年專欄呢？他說：「我（寫專欄）最大的報酬，還是我自信我以衰老之身，還盡了我『書生報國』的天職。我雖因三十多年前參加過黨政工作，而不願對當前的實際政治，有所論列；但我在分析世局的字裏行間，無時不以祖國的福祉為前題，無時不想對我艱苦奮鬥的當局貢獻極誠摯、極客觀的『芻蕘之見』。我祇求我心之所安，而不問當局是否重視或採納。」

景瑚先生，除了任大學校長時期專心一意要辦好兩所大學，心力交瘁，未遑寫作外，其他時間都是勤於筆耕的，可說著作等身。他要工業救國，學的是機械工程，祇在上海兵工廠作過一年工程師。但他對國家的供獻，十倍倍於工程師，這是他當年絕對沒有想到的。現在他去了，但他留給學生和千萬讀者的印象永遠不會磨滅。

效錄西北工學院在臺師生獻給他的專頌和西北大學校友會獻給他的大理石盤上的獻詞，以為本文的結語。

西北工學院臺北師生專頌：

文章華國，道理儒宗。長校西北，化育春風。勤以教學，訓作良工。師恩永誌，孺愛無窮。

西北大學校友會石盤獻詞：

黃河禹甸，歲紀五千。東夷入寇，學府播遷。公長西北，荆棘當前。片言止沙，力墾書田。儒宗孔孟，道濟人天。春風化雨，才育百年。遊踪萬里，遍涉名川。曠觀世局，燭照機先。閱中肆外，有筆如椽。高山仰止，敬獻斯篇。